

西方哲学通史

第一卷 ▶ 古代中世纪部分

赵敦华 著

朱德生 主编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出版社

西方哲学通史

第一卷 ▶ 古代中世纪部分

赵敦华 著

朱德生 主编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哲学通史 第一卷/朱德生主编;赵敦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9
高等教育哲学教材
ISBN 7-301-03156-4

I .西… II .①朱… ②赵… III .哲学史-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B5

31.1/18
书 名: 西方哲学通史 第一卷

著作责任者: 赵敦华著

责任编辑: 李昭时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156-4/B·0157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印 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25印张 532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定 价: 28.00元

本书承蒙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资助出版
谨此致谢

总 序

一

在我国的大学中,讲授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史还只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国人研究西方哲学思想,也不过一个世纪罢了,虽然它的传人可以推得很远。

上世纪末,甲午战争(1894年)的失败,粉碎了以为“船坚炮利”就能救中国的幻想;戊戌政变的流产,又在事实上宣告了改良主义之路不通。这些虽然还没有被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认识,但是,他们已经认识到闭关锁国、盲目排外是不行了,必须“师夷之长以制夷”(《海国图志》)。在这种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面前,更先进的人们开始意识到,维新图强要想成功,必须有一次国民思想上的启蒙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人开始引进西方哲学,并由介绍西方哲学进而研究西方哲学,至今刚好有一个世纪了。在这一个世纪中,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首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真理。没有马克思主义,便没有今天的新中国。这是任何人都得面对的一个历史事实,尽管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有不少经验教训,有待于我们去总结。其次,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有创造性的哲学家,如金岳霖、冯友兰等先生。他们在研究西方哲学、发展中国哲学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也是十分宝贵的经验。当然,在这个世纪中,我们也走了一些弯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我们的财富。要使这些历史的财富真正成为我们的财富,便要进行自觉的反思和总结。而且,这种反思和总结,既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期望某时能最终完成。历史的宝藏与地下的矿藏不同,后者是有限的,越挖越少,前者是无限

的,越挖越多。

如果简单地回顾这一世纪研究西方哲学的历史,似乎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由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二是由“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四是由“文化大革命”后到今天。我们这样划分,并不是想用政治事件规定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即并不是想用外在的规定来取代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定,仅仅是因为在我们还没有分析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之前,为便于把握这一历史进程的临时设定。

第一阶段的特点十分鲜明,国人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才引进西方哲学的,所以,对西方哲学本身,当时没有多少深入系统的研究,只是把它当作启发民智的一种手段而已。梁启超(1783—1929年)便是这个阶段的重要代表之一。他本是维新派的首脑人物之一,比康有为等看得更远些。特别是在戊戌政变失败以后,他亡命日本,视野更宽了。他在谈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时说:“自此说一行,欧洲学界,如旱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风驰云卷,仅十余年,遂有法国大革命之事。自兹以往,欧洲列国之革命,纷纷继起,卒成今日之民权世界。民约者,法国革命之原动力也;法国大革命,19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也。”(《论学术势力左右世界》,《新民丛报汇编》1902年,第452页。)他把培根、笛卡尔称作“近代文明初祖”,因为是他们学术上的革新,才有了“新道德、新政治、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家、新世界”(《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梁启超哲学论文选》,第84页)。梁启超对西方思想和西方哲学的介绍与传播工作,卓有成效地影响了几代人。胡绳同志说:“应该承认,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是做了富有成效的思想启蒙工作,帮助许多原来只知道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打开了眼界,并且从封建文化的对比中,更看到自己民族的落后,更强烈地燃烧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691页。)

不过,严复(1853—1921年)的工作更能反映这一阶段的特

点。他本是洋务派培养的人材。但他较早地看到了洋务派的败迹，转而介绍西方的文化与哲学。在甲午战争和戊戌政变失败后，他更是全力以赴从事西方哲学的介绍，特别是对其中的进化论思想。所以，他译作活动的现实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在这方面，《天演论》是最典型的译作。他曾经提出翻译要信、达、雅。但是，《天演论》却不是根据这种原则翻译的。书名便只取了原作书名(Evolution and Ethics)的一半。在内容上，也有取有舍，有所改造。他还加了大量按语，把进化论的主要内容和它在西方的发展作了系统的介绍。他一方面宣传“物竞天择”是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社会进化要靠人类自己的斗争。《天演论》的出版，在当时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胡适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上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以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四十自述》，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严复在介绍西方哲学方面的工作功不可没。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方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五十年来中国哲学》，见《蔡元培选集》，第216页。）

第二阶段，在系统介绍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开始了有创造性的研究。不过，大多数有成绩的哲学教授的兴奋中心，并不是想仅仅钻研西方哲学本身，而是想以之来改造中国的传统哲学，创立新的哲学体系。所以，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转型时期，即原来文史哲不分家的局面，在这个阶段上被打破了。至于西方哲学，人们重点注意的是思潮和人物的研究。在这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有陈康教授。他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可与当时西方学者一争高下。不过，从事西方哲学通史研究的人还很少。

新文化运动是这个阶段开始的标志。1915年9月15日，陈独

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以此为主要阵地,团结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向专制复古逆流,向千百年来的封建文化传统发动了猛烈进攻。这些人以科学和民主为武器,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新文化运动。

这种形势必然导致西方哲学更加广泛、更加系统、更加深入地传入我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4月,美国实用主义大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年)来华,先后去上海、南京、北京、广州等十多个省市作了一百多次讲演,历时一年零三个月。这些讲演后来由北京大学新知书店出版,书名为《杜威五大讲演》。1920年9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年)又来华讲学,在北京大学作了五个专题的系列讲演。这五个专题分别是“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学逻辑”。同时,他还到上海、南京、长沙等作了系列讲演。1921年7月他离华前,又作了“临别讲演”,即《中国的新自由之路》。同年11月北京大学新知书店也将这些讲演整理成书出版。1922年10月,德国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 1867—1941年)又来华宣传生机论。张君勱在介绍杜里舒来华的报告中说,北京讲学社原来请的是倭伊铿,但因倭氏年事已高,故由杜氏代劳。他先后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作了系列演讲。这些也都整理出版了《杜里舒讲演录》,其中包括《生机体之哲学》(12讲)、《近代心理学中之非自觉和下自觉问题》、《生机论的概念》、《国家哲学》以及他为《东方杂志》“杜里舒号”写的《生命问题上的科学与哲学》等。

这些哲学家来华以前,国内报刊总要先作一番介绍;这些人来了,当然就不仅是介绍了,而是带来了“原版”真货;这些人走了,不仅增加了一批信徒,而且还出了一批研究性专著。因此,形成了一次传播西方哲学的高潮。其中,有些论著,后来在中国哲学发展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1919年,胡适为欢迎杜威来华而撰写的《实验主义》一文就是一个典型。

当时系统传入中国的，不仅有传统的所谓西方哲学，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在这方面，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人为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特殊贡献。

这种群说并存的局面，必然引起争论。例如，1919年7月，胡适在《每月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把介绍和讨论社会主义称为“空谈”，因此立即遭到李大钊等人的反驳，引发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又如，1923年2月，张君勱（1887—1969年）在他的《人生观》讲演中，提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立即遭到了丁文江（1887—1936年）等人的反对。后者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便是所谓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如果说“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较量，那么“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参与的“主义”就更多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逆转，人们更加注意当前的现实问题，因而又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社会史”的争论。

在所有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都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它早就受到别的流派的关注和驳难。例如，胡适便认为，唯物辩证法是与科学方法对立的玄学方法。1931年，张东荪等人在《大公报》的“现代思潮”栏和《新中华》、《再生》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与此同时，叶青在《二十世纪》和《研究与批判》等刊物发表了对张东荪的反批判。1934年，张东荪把自己的文章编辑成了《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1936年，叶青又把双方的观点汇集成册出版，书名《哲学论战》。在参与这场争论的各种观点中，邓拓的《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和艾思奇的《论黑格尔之哲学的颠倒》比较重要。当然反映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高水平的是毛泽东

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不过当时哲学界熟悉这两部著作的人还不多。

综上所述，自 20 年代前后开始，由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的大量输入，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发生了转型性的变化。原来文史哲不分的传统被打破了。哲学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这特别反映在学校的教学上。例如，北京大学在 1911 年便有了理学门（相当于哲学门），但所开的课程仍然是先秦诸子及程、朱、陆、王等各家学说。1914 年正式建立了中国哲学门。课程也宽了一些，有《中国哲学史》、《哲学概论》、《伦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1917 年以后，课程变化便更大了，有了《西洋哲学》、《印度哲学》、《唯物史观》等等。不久，外语列为必修课。1917 年底，还成立了哲学门研究所。研究所设定的项目中，除了中国哲学外，还有希腊哲学。而且当时校内学术讲演甚多，自由讨论成风。1917 年，北大哲学门正式改名为哲学系。至此，不再像本世纪初那样，仅仅在报刊讨论中才谈及西方哲学，它现在正式进入了高等学府，成了哲学系学生的必修课。1925 年 4 月，成立了中国哲学会。1927 年创立了《哲学评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专门的哲学学会和哲学刊物。

总之，在这个阶段上，西方哲学的研究是相当系统相当深入了。正如上面提到的，陈康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已经达到当时国际一流学者的水平。他自己亦豪迈地说：“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还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0 页）文中提到的编译会，即贺麟先生在 40 年代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它在介绍西方哲学名著方面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贺麟先生的推动和主持下，一大批西方哲学名著翻译出版了中文本。这

当然大大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不过,当时高校哲学系的西方哲学史,还没有自己的教材。虽然社会上也出版了一些国人编的西方哲学史(一般称西洋哲学史)著作,但大多是比较简单的编著。所以,大学生的教材还是用西方人的著作。例如,北大哲学系比较重视哲学史的教学,张颐先生(解放前北大哲学系主任)在主讲此课时,用的课本就是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年)的《哲学史教程》(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第三阶段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一时期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困难时期,却又是建设西方哲学史这门学科的重要时期。或者说,西方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是在这个时期才突出出来的;但它又受到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而度日维艰。

新中国建国之初,为迅速而有效地按照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原有的哲学教学体系,1952年夏,全国各高校的哲学系都合并到了北京大学。按原苏联的教学模式,系下按分支学科设立“教学研究室”,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当时东方哲学还没有成立单独的教研室,后东方哲学分出,才改称西方哲学教研室)等等。各校来的老教授、老教员几乎都分别归属于中、外哲学史教研室。因为原来他们研究的都是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就出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不管这些人原来是研究哲学还是研究哲学史的(其实,绝大多数是研究哲学的,而且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体系),现在都只能研究哲学史了。这样无意识中把哲学史的独立地位凸现出来,而且大大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力量。

不过50年代初,实际上他们也没有从事哲学史的研究,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可以说是筹建哲学史课程的理论准备。其次就是资料上的准备。正是从这时开始,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在室主任洪谦教授的主持下,开始出版了“西方古典哲学

原著选辑”。后任华教授继任室主任期间，仍继续了这项工作。在“文革”前，这套选辑共出了四卷：即《古希腊罗马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哲学》。这套选辑对我国西方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以及相应的人材培养，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甚至对当时整个哲学界也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后，哲学系恢复西方哲学史课程是 50 年代中期。教研室集体编写了讲义。当时的指导文献就是日丹诺夫的《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日丹诺夫说：“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那末，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4—5 页）这个定义成了当时教学与研究的唯一指导思想。

按照这一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古典哲学，还有某种历史价值；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的其他各种哲学流派，则都是反动的。所以，从 50 年代起，一说哲学史便专指古典哲学，不包括现代哲学。这一“传统”一直维持到 80 年代后期才打破。同时，一切哲学流派和哲学思潮，都要按唯物或唯心来定性。若为唯物主义，则可能还有某种合理性和进步性，若为唯心主义，则必然是反科学的、反动的，只能彻底加以否定，因为，唯物主义是进步阶级的思想代表，唯心主义是反动阶级的思想代表，等等。

对这些“毋庸置疑”的原则，在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中，人们总觉得它与历史的事实有矛盾。中国哲学史课程在 1955 年以前便由冯友兰和张岱年两教授开出了。为了建设好新的中国哲学史这门课，该教研室常常举行学术研讨会。西方哲学史是 1956 年新学年才开出。参考了原苏联的多卷本哲学史，理论上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正值此时，党中央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广大教

师都十分兴奋,以为学术上自由讨论的春天来到了。郑昕、冯友兰、洪谦、张岱年等教授纷纷发表文章,表示拥护党中央的这个方针,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为此,中宣部建议由北大哲学系召开一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以利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会议是1957年1月下旬在北大俄文楼召开的。当时哲学界的主要人物(包括不在岗的)都应邀参加了这次讨论会。讨论得十分热烈,争论得也十分激烈。

会议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关于唯心主义哲学的评价问题,二是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显然,这次会议是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会,不是专指中国哲学史而言。贺麟教授在第一个问题上的观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不能等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歧。同时,以往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在理论上也不够辩证和唯物。“所谓不够辩证,是说把唯物唯心两者之间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绝对对立,没有相互联系、相互继承关系;所谓不够唯物,是说没有仔细地了解敌情,没有好好地掌握材料和事实,这也是主观主义。”(《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96页。)冯友兰先生则针对哲学史研究中讲批判否定多,讲吸收继承少的现象,提出“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比如,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这句话的具体意义看,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从这方面去了解,这句话对于现在就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不是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从这句话的抽象意义看,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地经常地温习和实习,这都是很快乐的事。可是,也不是所有的命题都有这两方面的意义。”冯先生的这一观点,被概括成了所谓“抽象继承法”,几十年来一直被批判。

在这次会议上,争论中有些用词也很激烈,但是,总的气氛还可

以，是一次百家争鸣的会议。可惜这种气氛没有能持续多久，便发生了“反右”斗争。问题的性质便骤然发生变化。一切都要从“政治的高度”去看。所谓“百家”，实质上只有两家：一家是无产阶级，一家是资产阶级；所谓“争鸣”，不过是树立一些反面教员，以便更好地教育群众。

可能是由于上述形势，所以，北大自己编的西方哲学史讲义，一直没有公开出版。北大哲学系也与50年代后半期兄弟院校新成立的哲学系一样，学生的读本都是苏联的多卷本哲学史。

但是，那几年正好中苏关系矛盾表面化。这就促使我们各方面的工作，由“一边倒”转向寻找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集中全国一部分人力，组织编写全国高校统编教材。哲学组下设的西方哲学编写组，由任华教授任主编。1960年6月，从北大和人大抽调的人员便集中到了中央党校。编写组在党校住了三年多。这个时期，正是国内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政治运动相对少了一些。编写组认真地查阅了大量文献，到1963年底，全部书稿都已基本完成，绝大部分已经油印成册，在部分学校开始使用。参加这次编写的青年人，业务上也得到很大的提高。1964年初，政治形势又紧张起来了，所以编写组成员回到学校以后，再也无暇顾及教材书稿了。同年下半年，绝大部分成员都先后下乡“四清”去了。有的人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才回校。辛辛苦苦工作了三年才完成的这部书稿不仅没有能及时出版，而且由于“文革”而失散了。

“文革”中，一切教学与科研活动全部暂停。西方哲学属“封、资、修”之列，更是如此了。直到70年代初，毛泽东发出要学点哲学史的号召，才又逐渐恢复了这方面的工作。北大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在70年代前半期先后编写了两本欧洲哲学史，一是由教研室集体编写，几经修改，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洲哲学史》。二是由“欧洲哲学史进修班”学员起稿，后由教员改写、增补而编定的《简明欧洲哲学史》。前者是作为本系教材编写的。当时曾想克服一些以往教条化、

简单化的缺点,叙述和分析尽可能以原始文献为根据。但仍然是以唯物、唯心为主线,同时,也没有现代哲学部分。此书在各高校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后者原计划为通俗读本,它只有古典部分,但写得成功,才彻底改写成简史,并增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刚好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版的,曾被推荐为高校教材。

至于现代西方哲学,由于“反修”等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60年代起,在北大等部分高校开设了“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一课。北大西方哲学教研室也为此集体编写了一部油印的讲义。不过,这些执笔的专家大约都不满意于自己的“批判”。所以,油印讲义虽然在别的学校有所流传,却从来没有出版的计划。只是在统编教材的过程中,领导上委托洪谦教授主编了一部《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此书是上述课程的主要参考书。

不过,有件事值得一提,即当年因为政治形势的需要,由有关的领导部门组织,翻译了一大批现代西方哲学的原著。当时虽为内部发行(现已公开发行),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1964年,在毛泽东加强对理论的研究这一批示的推动下,北大决定从西方哲学教研室抽调部分人员,组建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所”,洪谦教授任所长。不过,还没有等研究所的工作展开,“四清”、“文革”等大运动便到来了。

总之,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绝对真理,排斥对别的哲学的研究,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无产阶级政治,而把哲学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实际上就堵塞了学术上开展“百家争鸣”的可能性。这样,不仅使西方哲学的研究无法深入下去,同时,也大大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

第四阶段,从形式上说,始于粉碎“四人帮”。确切地说,始于1978年在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史讨论会”,因为这次会议明确提出

了要克服日丹诺夫定义所造成的片面性,实事求是地来研究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

当时,安徽劳动大学哲学系(即现在的安徽大学哲学系)编了一部近代欧洲哲学史。在商务印书馆校阅书稿的过程中,他们与北京的同志谈起,表示愿意承办一次讨论会,并与北京大学哲学系、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联合发起,于1978年10月召开了这次讨论会。因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哲学、社会科学界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所以,到会的人很多(300余人),其中不少人是专攻中国哲学史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甚至还有非哲学专业的。那几年,全国正在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它为这次讨论会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会议就方法论问题,特别是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剖析了以往的教条主义的危害性。讨论的气氛既热烈又很融洽。

是年年底,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这才真正开创了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全新的时期。

现在,西方哲学(即使现代西方哲学)不再是禁区了。不仅西方哲学的原著进口的多了,而且还大量翻译出版了许多西方哲学的代表作。特别是西方现代哲学方面,译著已相当系统、全面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派了许多年轻人到西方各国学习哲学,其中有很多已经回国工作,在教学与科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文革”以前,对西方哲学,报刊杂志上除了偶然有点批判文字以外,真正研究性的文章几乎没有,更不用说有关这方面的专著了。但80年代初到目前为止,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展开。特别是现代哲学部分,更是如此。无非是因为原有的基础比较薄弱,所以,大部分研究还是打基础的工作。当然,其中也走过一点小弯路,主要是有关领导部门,还没有认识到这方面的研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不可少的工作,甚至仍然认为它是有害的。但是,客观事物的进程终究不可能以少数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

我们的事业还是前进了。

研究工作的展开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全国性学会的成立。外国哲学史学会是1981年成立的。并在1984年、1988年、1994年先后开过三次全国性的讨论会。80年代的前半期,受国家教委(当时称高教部)的委托,以高校西方哲学史教学研究会的名义,在辽宁大学办过一次为期半年的欧洲哲学史教师进修班。这些都大大促进了研究人员队伍的扩大和研究工作的发展。

特别要指出的是,8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哲学史专业毕业了一大批研究生(有国内的,有国外归来的),大大改变了研究人员队伍的业务素质。

从以上简单的回顾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对西方哲学研究的历史,是一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既然是寻找,难免走一点弯路。而且,救国救民的道理还不等于救国救民的实践。由理论到实践,也会走一点弯路,凡此种种,我们都付出过很高的代价,特别是后一种弯路,几乎弄到亡党亡国。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勇敢地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批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又在大步地向前进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记取以往的经验与教训,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二

现在兄弟院校所编的西方哲学史教材很多了,为什么我们又要再编一部呢?

一是为了总结自己这十多年来教学中的经验教训,二是为了使兄弟院校教材中的各有所长,能为我所用,三是希望能反映当前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教材不是专著,它应该及时报道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隔些年便得重编一次。这次我们重编的想法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历史事实,不应否定。但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为唯一标准来概括全部哲学史,又简单化了。这也是历史事实。同时考虑